

# 西藏古代石碑和石刻文化 ——访著名藏族学者巴采·巴桑旺堆先生

西饶果恰(采访)

直贡朗杰<sup>①</sup> 平措塔杰<sup>②</sup> (译)

(<sup>①</sup>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 <sup>②</sup>西藏大学科研处 西藏拉萨 850000)

**摘要** 著名学者巴采·巴桑旺堆先生是西藏自治区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现任中国民族历史研究会副会长、国际藏学研究会理事。多年来从事藏族古代史、吐蕃墓葬、古代石碑、古藏文写本等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外有较大影响。通过对巴采·巴桑旺堆先生的采访,我们对古代藏文石碑或石刻文字的相关问题有了进一步了解。

**关键词** 西藏古代石刻文字 坐落位置 内容

**中图分类号** K877.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5738(2009)03-033-07

西饶果恰:老师您好!我想向您请教关于西藏古代石碑历史的几个问题,首先请您详细介绍一下关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石碑及石刻文字的历史。

巴采·巴桑旺堆: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古代藏文石刻文字,是我们藏民族文化遗产中的宝贵财富。我在此处所指的古代石刻文字主要是指属于吐蕃王朝及11世纪的文化遗产。目前,粗略估计已发现的属于这一时期的石碑和石刻文字大概有24件。其中,吐蕃时期的石碑和石刻文字,约有21件;藏传佛教后弘初期的石刻文字有3件。从以上石碑和石刻文字的年代来看,最早的是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期所立的石碑,比这一时期更早的藏文石碑尚未发现。吐蕃时期的21件石碑和石刻文字中,赤松德赞(在位:755—797)时期有4件,赤德松赞(在位:799—815)时期的石刻文字最多,有9件左右,分布在卫藏、康区和安多地区。此外,赤德祖

赞(在位:815—841),即赤热巴巾时期的石碑有5件。具体年代尚未确定,但属于吐蕃遗物的有3件。以上所提到的石刻文中,不包括印度、拉达克等地发现的吐蕃时期的摩崖刻文。

具体来讲,属于赤松德赞时期的有4通石碑:桑耶寺的兴佛证盟碑、拉萨“雪”碑,即恩兰·达扎禄恭记功碑、工布朗噶碑和琼结桥头石碑。需要关注的是朗噶碑至今不被学术界所熟悉,此碑位于林芝地区米林县丹娘乡朗噶村,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曾有一篇粗略介绍该石碑的文章发表在《雪域文化》上,作者为区文管会欧朝贵先生。因碑文长期受自然侵蚀,文字基本上无法释读,因此欧文不涉及碑文内容。我曾三次前往朗噶村进行实地调查,并查阅相关史籍,可以确定此碑是赤松德赞时期所立,并确信该碑文是赤松德赞国王颁发给工噶布王,明确其特权的诏书。原因有二,一是石碑头一句“赤松德赞

收稿日期:2009-07-10

**第一作者简介** 直贡朗杰(1972-)男,藏族,西藏拉萨人,西藏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民间文学、格萨尔学。

在世期间”的字样还可辨认;二是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石提及赤松德赞曾给工噶布王颁布诏书一事,应该与此碑有关。琼结桥头石碑,现坐落于山南地区琼结县人民政府大院西北侧,碑刻文字主要记载了赤松德赞的功绩,多数学者认为此碑立于赤松德赞在位时,但也有一些研究者对此提出了质疑,认为这是赤松德赞的儿子赤德松赞为了纪念其父王的功绩而立的石碑。我们在此处把此碑归于赤松德赞时期。

赤德松赞于798年前后继承王位,于815年驾崩。虽然此王在位时间只有短短的十几年,但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产,有9件石碑和摩崖刻文。赤德松赞是藏族古代史上对佛教在藏地的弘扬做出过极大贡献的一位赞普,他在位期间留下的一些石碑和摩崖刻石重申了对佛法、沙门的保护和支持。后期一些藏文历史著作把赤德松赞和其王位继承人赤祖德赞混为一人,许多赤德松赞的佛法业绩张冠李戴,被视作赤祖德赞所为。赤德松赞时期的9件石刻文字可以分为碑文和摩崖刻石两种。碑文有噶琼碑,坐落于拉萨河以南热玛岗村(堆龙德庆县柳梧乡境内),与哲蚌寺遥相隔望;谐拉康西碑和东碑,位于拉萨市墨竹工卡县境内谐拉康寺。刻石有谐拉康刻石,保存于墨竹工卡县境内谐拉康寺;工布雍仲增刻石,位于林芝地区林芝县雍仲增村;洛扎摩崖刻文,位于山南地区洛扎县境内;扎雅丹玛摩崖刻文,位于昌都地区察雅县境内;玉树摩崖刻文之一和玉树摩崖刻文之二,位于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赤祖德赞时期所立石碑有琼结县境内赤德松赞墓碑、拉萨市大昭寺前的唐蕃会盟碑、日喀则地区拉孜县境内的冲钦碑、拉萨市堆龙德庆县楚布寺碑、阿里地区普兰观音碑等。

属于吐蕃时期,但具体年代未能确定的有云南丽江发现的刻石、达孜县查叶巴寺保存的小型刻石和工布江达县江达乡境内新近发现的摩崖石刻文。属于后弘初期的有3通石碑,即林周县(彭域)杰拉康碑、堆龙热擦寺碑和扎囊县扎其乡藏仲碑。

以上就是西藏古代刻石碑和石刻文字的基本情况。

西饶果恰:我们所了解的石碑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有哪些新发现?

巴采·巴桑旺堆:上述吐蕃时期的21件石碑和石

刻文字中,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由国内外学者所发现的,并且刊布发行供研究的仅有12件。即,桑耶寺的兴佛证盟碑、“雪”碑、琼结桥头石碑、噶琼碑、谐拉康西碑、谐拉康东碑、谐拉康刻石、工布雍仲增刻石、赤松德赞墓碑、唐蕃会盟碑和楚普寺碑。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的藏学研究进入了繁荣时期,有许多新的吐蕃时期的刻石发现,为我们研究古代藏族历史提供了极有价值的史料。其中,重要的有在山南洛扎县发现的内容相同的两处摩崖石刻文字;在昌都察雅县发现的丹玛刻石;在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境内勒巴沟的两处刻石;阿里普兰发现的观音碑等。以上刻石或碑文在传统史料中未有记载,是在当地群众的引导下发现的。如,1981年我们在洛扎县新发现的摩崖刻文就属于这种情况。在1982年的《西藏研究》第2期上,我以一篇短文介绍了洛扎摩崖刻文,现在看来文章很粗糙,书写的碑文也有错误,但这件事情是我开始关注和研究古代石刻文字的一个起点。1990年,在查叶巴寺发现该寺保存了一通方形残碑,高不过35厘米,四面各刻有一人姓名,其中两人为大臣,两人为比丘,该寺僧人称此碑为吐蕃末代著名僧人拉龙·白吉多杰的“魂石”。从文字字形、姓名特点来看,残碑属于吐蕃遗物是确定无疑的。当时,这个新发现在《拉萨晚报》作过简短的新闻报道。2008年,我和西藏博物馆的副馆长索朗航丹一起到工布江达县进行调研,在此过程中,在江达乡一块岩壁上发现了一些刻有人名的古文字和佛塔之类的岩画。根据文字特点,我们一致认定是吐蕃时期刻写的文字。

西饶果恰:在国内外研究者中,对西藏古代石碑和石刻文字方面是如何进行研究的,有哪些相关的研究成果?

巴采·巴桑旺堆:最早研究吐蕃石刻文字的应该是藏族学者。16世纪,著名历史学家巴俄·祖拉陈瓦在其历史名著《贤者喜宴》中就收录了桑耶兴佛证盟碑的文字等碑文资料;18世纪著名学者噶托·仁增次旺罗布抄录了琼结桥头碑、工布雍仲增刻石等。另外,早在14世纪,《五部遗教》中也收录了与吐蕃碑文极为相似的文字;近代学者更顿群佩先生和霍康·索朗班巴于1946年抄录和研究过噶琼碑。

从国际上讲,最早研究应追溯到十九世纪八十

年代。一些国外学者开始研究唐蕃会盟碑,1904年随英国荣赫鹏所率军队进入西藏的英国人瓦德尔于1909年在英国发表了研究“雪碑”和唐蕃会盟碑的文字,但碑文的释读、理解都很肤浅,处于研究工作的开拓时期。当时国外学者研究这两通石碑入门较为容易,原因有二:一是石碑坐落于拉萨,容易接触;二是这两通石碑的文字内容主要反映了吐蕃时期的唐蕃关系,而唐蕃关系在《唐书》等汉文典籍中均有记载,国外学者有条件接触汉文典籍,从而他们可以借助汉文文献,对碑文比较容易开展研究。上世纪四十年代后,在国际上研究西藏古代石刻文字的主要学者有英国人黎吉生、意大利学者图齐、美国学者李方桂和柯蔚南、日本学者佐腾长、山口瑞风等。在这些学者中,黎吉生、图齐、李方桂的研究较为系统、深入。其中英国人黎吉生出版过多部有关古碑文的著作,发表过许多碑文的照片。他是1936年至1949年期间英印政府及其后的印度政府(1947年印度独立)的驻西藏商务代表,有机会到西藏各地临摹和研究石刻文字。黎吉生于1952年和1985年先后用英文出版了两本较详细介绍西藏古代石碑的专著。1952年出版的专著可以说是一项初步研究,由于没有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借鉴,又缺乏相关文献资料,所阐述的观点大多存在揣测性,更主要的是受其政治观点的制约,其研究著作中有许多错误。1985年出版的著作,吸收了众多专家对石碑及石刻文字的研究成果,增加了学术性。意大利学者图齐的文章和所公布的碑文图片在国际上影响很大,推动了古碑文的研究。美国籍华人李方桂和他的学生柯蔚南于上世纪80年代出版了英文版的《古代西藏碑文研究》一书,有王启龙博士的汉文译著。李方桂教授的著作在吸收其它学者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碑文文字、释读、翻译等方面有较大的突破。

在国内,清末就有学者开始研究吐蕃碑文,如,罗振玉在1909年就研究过唐蕃会盟碑。民国时期,罗常培发表过唐蕃会盟碑拓片。解放后,国内学者研究成绩卓著,1982年中央民大王尧教授出版了《吐蕃金石录》(汉文版)一书,1985年王尧教授和陈践又出版了藏文版的《吐蕃金石录》。后来西北民大高瑞(贡确次丹)教授的《古代藏文文书》(藏文)一书收录了迄今为止已经刊布发表的石刻文字,并有

注释和内容解读。而对某一个碑文的重要研究有恰白·次丹平措先生于1986年发表的关于对丹玛摩崖刻石的研究论文;有西北民族大学研究员高瑞和白玛本关于对青海玉树藏族自治州两处石刻文字研究成果;有冯智等学者有关云南丽江石刻文字的研究;有西藏学者次仁曲杰和达瓦次仁对阿里普兰石碑文字的研究;有西藏大学扎西达瓦先生对工布雍仲增刻石的再解读等等。我在1982年和1996年有两篇关于新发现的洛扎摩崖刻石和冲钦石碑的研究文章发表在《西藏研究》上。以上论文有些是对新发现的石刻文字的解读,有些是对一些问题的商讨,如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石名称问题的探讨。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石在国际上称为工布摩崖刻石,国内有些学者则称作工布德木摩崖刻石。准确的名称应该是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石,因为此刻石坐落于雍仲增村,国内之所以有德木摩崖刻石的名称,因为文革时期雍仲增村隶属于德木区,但事实上雍仲增村距离德木还有10公里的行程。

回顾国内外的研究历程,目前对西藏古代石碑和石刻文字的研究还存在一些问题。在黎吉生、李方桂和王尧的著作中,1980年以后发现的多数石碑和石刻文字未能来得及列入其中。只是在黎吉生1985年著作和李方桂1987年的著作中,收录了我在1982年刊布的洛扎摩崖刻石。

西饶果恰:在西藏的历史典籍中古代碑文的研究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巴采·巴桑旺堆:藏民族对历史典籍及其传承是非常重视的,在《朗氏家族史》中有一句名言:“生为人身,若不知道自己的族属,则宛如林中的猕猴,人若不知自己的母系血统,则犹如虚幻中的苍龙”,表明藏民族在很早的时候就关注本民族的起源和历史。可以说,我们祖先关于吐蕃时期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文献记载相当丰富,并且把很多内容刻在石头上,是为了传世永久。但随着历史的发展,11世纪藏传佛教进入后弘期,西藏的历史典籍的记述方法开始发生了变化。具体有什么变化呢?后弘期及其以后历史典籍中,开始大大加重了佛教内容的份量,对原有世俗历史的记载未给予足够的重视,使其处于逐渐消亡的地位,西藏再也没有问过类似敦煌古藏文历史文书一类风格的历史文献。托名为吐蕃文书的,记载松赞干布事迹的《柱间史》



和《牟尼宝训》等书中,几乎再也看不到政治、军事上具有雄才大略、叱咤风云的松赞干布的形象。当然,《五部遗教》、《德乌教派源流》等著作中不乏珍贵的古代历史资料。但总体上,世俗历史的记载仍处于边缘化的地位,极其不受重视。如14世纪问世的《西藏王统记》,记述的主要内容是吐蕃“三大法王”松赞干布、赤松德赞和赤热巴巾在宗教上的伟大功绩,而对“三大法王”当政时期的世俗历史,包括政治、军事、经济等非宗教方面记载十分有限。该书作者萨迦派高僧萨迦·索朗坚赞曾谈及他在撰写《西藏王统记》时,搜集到了很多古代史料,但因这类文字与佛法关系不大,因此弃之不用。萨迦·索朗坚赞的话语使我们感慨不已,我们设想,如果在《西藏王统记》中保存或引用了许多古代珍贵历史资料的话,对我们今天的研究可以说受益无穷。

尽管如此,藏族历史上还是出现过几位重视西藏古代石碑和石刻文字的学者。在这些学者中,如前面所谈到的巴俄·祖拉陈瓦的贡献最大。在其著作《贤者喜宴》中所收录碑文史料价值非常大,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历史遗产。五世达赖喇嘛所著的《西藏王臣记》在记述吐蕃后期的唐蕃关系时,也引用了唐蕃会盟碑上的文字,可以看出五世达赖喇嘛对碑文是比较重视的。18世纪著名的宁玛巴高僧噶托·仁增次旺罗布是一位对历史有高度兴趣的人。他游历藏区,遍访名胜古迹,广泛搜集资料,有许多涉及历史的著作传世。他所著《下阿里贡塘王世系》一书(收录在西藏古籍出版社出版的《西藏史籍五部》中)是研究下阿里地方(今日喀则地区吉隆县辖境)历史的不可缺少的史料。他抄录了琼结桥头碑、工布雍仲增刻石等的文字,尤其是他抄录的琼结桥头碑文字十分完整。今天该石碑虽然存世,但绝大多数文字漫漶,无法释读,如果没有噶托·次旺仁增罗布留给后人的碑文抄件,我们将失去一份重要的历史资料。英国人黎吉生的著作中所刊布的琼结桥头石碑文字,就是以噶托·仁增次旺罗布的著作中的抄文为蓝本。因此,可以说巴俄·祖拉陈瓦、五世达赖喇嘛和噶托·次旺仁增罗布三位学者,是对西藏石刻文字进行研究的少有先驱。哲蚌寺保存有古代碑文如唐蕃会盟碑的一些抄件,遗憾的是不够完整,字形也未能按原文抄录。

西饶果恰:西藏古代石碑,对研究吐蕃史有何作

用?

巴采·巴桑旺堆:藏民族拥有十分丰富的古代文献资料,从古文献产生的时间来看可以分为两个时期,即:吐蕃文献(或称作前弘期文献)和后弘期文献。所谓的吐蕃文献有五种类型:一是吐蕃的碑文和金铭;二是敦煌文献;三是西藏和其他藏族地区保存的吐蕃时期的佛经及其它写本;四是新疆和田等地发现的简牍文;五是后弘期史籍中保存或引用的吐蕃原始史料。这五种文献或资料是研究西藏古代史、特别是吐蕃和藏族远古历史的珍贵文献资料。其中,石刻文字的史料价值是无庸置疑的。以下列几点作举例说明。

一、目前发现的石碑文字数量不大,仅有二十余件,但都是立碑时所刻录的,后人没有对此进行篡改,因此具有很高的可信度。

二、石碑文字不但具有历史的真实性,而且这种真实性是我们考证其它文献资料准确性的依据。比如,我们通过噶迥碑文可以进一步考证松赞干布时期建造大昭寺的相关记载。

三、其他史籍,如敦煌古藏文文献记载,都松芒波杰赞普曾征战过南诏境内的乌蛮、白蛮。这一记载说明,今四川省甘孜州德格县一带应该是都松芒波杰赞普出兵南诏时的活动地区。噶琼碑记载,都松芒波杰赞普在“岭”(今德格境内)一地建有寺院,印证了他曾在靠近南诏的德格等康区活动的事实。

四、工布雍仲增石刻文字记载的是工噶布王的历史,弥补了藏族古代史上重要的缺漏,同时纠正了一个错误的记载。从刻石我们得知工噶布王是吐蕃赞普的王族支系,是直贡赞普的王子。传统史料记载,直贡赞普为吐蕃第8代赞普,而敦煌古藏文文献中记载“直贡赞普是第7代赞普”,那么,如何考证他是第7代赞普呢?我们发现在雍仲增摩崖刻石的记载中也说直贡赞普是第7代赞普,这恰好证实了敦煌文献记载的真实性。

五、在记述吐蕃赞普赤松德赞功绩方面,后弘期之后的一些文献中有“赤松德赞时期国力非常强盛,势力范围非常广阔,统治了天下三分之二的土地”的说法。但这类辞说,归于泛泛,没有更详细的记载。琼结桥头石碑记载赤松德赞当政时期,吐蕃国力强盛,疆域“西临大食、东达陇山”,这恰好印证了新、旧《唐书》等汉文资料中的相同记载。

六、昌都察雅县的丹玛摩崖刻石为我们研究吐蕃僧人何时出任大臣的这一重要历史事件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以往学术界并不清楚,僧人何时出任吐蕃宰相级大臣一职。从唐蕃会盟碑得知,821年,吐蕃首席宰相为僧人钵阐布云丹,而丹玛摩崖刻石印证了早在赤德松赞在位时期,僧人已经位列宰相。这一重要记载为我们研究早期西藏历史上僧人掌握政权、宗教干预政治是如何形成提供了珍贵资料。

七、汉文文献记载,公元763年,吐蕃军队攻占唐都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对此,传统藏文文献中对此没有详细记载,而“雪”碑(达扎禄恭记功碑)记载了达扎禄恭是如何参与谋划进军唐朝腹地,并与另一位将军一起率领吐蕃大军占领长安的事迹,同时也记载了唐代宗逃往陕州一事。这种记载恰好与汉文史籍互为印证。

八、《西藏王统记》记载文成公主在丹玛摩崖上刻有文字和佛像,这种说法已经延续了七百年多年。丹玛摩崖刻石证明,此石刻文字是在赤德松赞时期,即猴年(802年)刻立的,比文成公主入藏时大约晚了近161年,因此,根据石碑和石刻文字,我们可以纠正错误的历史记载和传说。

以上是几点例子而已。当然,古代石碑文字的作用不仅体现在历史研究方面,还对宗教和语言和文字研究及其相关文化的研究都有很高的价值,特别对藏语文的演变与发展方面的研究有独特的作用。

此外,与碑文相随的摩崖石刻的佛像和图案也有重要研究价值。尤其是丹玛摩崖和玉树摩崖上所刻大日如来佛像以及白云、荷花、龙、飞仙等多种图案是研究吐蕃时期石雕艺术的第一手资料。早期吐蕃佛教岩画中,大日如来像十分盛行,一些专家认为这与当时传入西藏的密宗有关。根据吐蕃盛行大日如来崇拜的现象,我们可以发现这样一种历史现象:大日如来像不仅出现在岩画上,许多历史悠久的寺院主殿供奉的也是大日如来,这种现象很可能也影响了佛教后弘初期的一些寺院殿堂的布局。

西饶果恰:西藏古代石碑和石刻文字与敦煌文卷之间有什么联系呢?

巴采·巴桑旺堆:石碑文字和敦煌文献有很多共同点。

首先,敦煌古藏文文献和西藏古代石刻文字都

是一千多年以前的古文字,是藏民族祖先给后人留下的宝贵遗产,其史料的可靠性和真实性是后期著作无法比拟的,因而是研究西藏古代历史、经济、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重要文献和参考资料。

其次,敦煌文献里记载的历史事件与石碑文字的记载,有许多可以相互证实。在前面所举例子中可略知一二。

再次,敦煌文献和石碑文字均为一千多年前的文字,二者的语法、语言风格以及字形特点等都具有相同的特点。

西饶果恰:吐蕃石刻文字和敦煌古藏文文献的字体有什么特点,与后期的字体有什么区别?

巴采·巴桑旺堆:一般而言,古藏文文献基本上是由楷体、行书两种字体,即“吴坚”(dbu chan)与“吴梅”(dbu med)书写的。上世纪中叶敦煌古藏文文书陆续刊布以来,我们注意到一种现象,敦煌藏经洞的藏文佛经写本,尤其是重要典籍基本上由标准的楷体书写的,与西藏遗存的前弘期的佛经写本的书写字体相同,只是有些写本的字形稍逊。而敦煌古藏文中的许多历史、社会、经济、法律 and 文学等方面的文书则是由楷体和行书两种字体混写而成。2006年西藏新发现的吐蕃苯教文书也是属于楷体和行书两种字体混写的风格。所谓楷体和行书的混写体可以分为两种形式:一种是楷体为主,以少量的行书为辅之;另一种是以行书为主,少量的楷体夹书其中。我们感到不解的是,对混写体风格,传统学者的著作中找不到相关的论述。更敦群佩先生研究了敦煌古藏文文书的字体后曾认为,“行书不是从一开始就有意创制的,而是楷体快速书写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大师的这一反传统的新颖观点在藏学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为后辈学人提供了广阔的思索空间,推动了藏文字的研究工作。

古代石刻文字绝大多数字体为楷体,其中有些碑文如桑耶寺兴佛证盟碑、“雪”碑、噶琼碑、谐拉康寺碑的“吴坚”字体也很规范,而有些刻石,如洛扎摩崖刻石等字体潦草。从字体特点来看,石刻文字与敦煌古藏文文书字体属于同一个时期的产物,风格十分古朴,许多特徵相同。11世纪及其后的藏文文书,即后弘期的写本基本上是由楷体与行书两种字体书写的。其中,重要佛学典籍如《般若波罗密多经一八千颂》皆由标准、典雅的楷体书写的。而这一

时期问世的诸多历史、传记类著作和一般的宗教文献基本上是由纯行书体书写的,与前弘期的文献的混写体风格有别。传统藏族学者认为,前弘期的文字学家创造了八种楷体字体,从遗存的前弘期楷体文书写本来看,有理由认为这八种字体是随着文字的发展逐渐形成的,并非全是前弘期的产物,对八种字体十分形象化的描述似乎是后期学者的赞誉。

西饶果恰:碑文记载的具体内容涉及哪些方面?

巴采·巴桑旺堆:碑文记载的主体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是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吐蕃时期,赞普、大臣和王族之间经常举行盟誓,以便确定、巩固、约束相互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责。盟誓的誓言则刻在石碑上,以传后世。如,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石是赞普颁给工噶布王的诏书,诏书开篇首先追朔了工噶布王作为吐蕃王室后裔的渊源,尔后赞普明确工噶布王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重申地方官员不得强制性地加重工噶布王所需缴纳的赋税,不得侵害工噶布王所属的土地、臣民等。“雪”碑、谐拉康寺碑、工布雍仲增摩崖刻石、洛扎摩崖刻石都属于这一类型。

第二方面是与宗教有关的内容。在赤松德赞、赤德松赞两位赞普执政时期,大力推行扶持和保护佛教的政策,佛教在吐蕃的传播与发展达到了高峰,这自然引起了苯教徒及信仰苯教的大臣的激烈反对,为此时常发生尖锐的政治斗争。为了保护佛教的正常传播,平息苯教徒的反抗,赞普通常与大臣、王族之间举行盟誓,参与盟誓的人要立誓永远信奉、保护佛教,并把誓言刻在石碑上。

第三方面是刻有佛教经文的,如丹玛摩崖刻石、玉树摩崖刻石等。

西饶果恰:有些石碑的基座为石雕龟形,它有什么具体的内涵吗?

巴采·巴桑旺堆:石碑的基座不仅有石雕龟形、还有方形石基,上面雕有大象、“雍仲”、莲花、火焰等。而基座为石雕龟形的原因,应该与吐蕃赞普时期在政治、宗教、文化、经济等各方面与唐朝有密切的联系有关,受唐朝文化的影响较大。松赞干布以来,历代吐蕃赞普致力于开拓疆域,对外实行开放政策,吸收周边地区的先进文化,尤其是从唐朝文化中吸收了许多有益的成分。我们知道,石碑基座为龟形

是中原盛行的文化现象,龟以长寿闻名,石碑以龟雕为基座,目的是赋予碑文传世久远的愿望。

西饶果恰:根据一些史书记载,吐蕃赞普祖系源于古代印度,但碑文和敦煌古藏文中却明确记载吐蕃第一代赞普是天神“恰”吉雅拉达珠之子。对此,我们如何理解?

巴采·巴桑旺堆:关于吐蕃赞普的祖源,古藏文文献中有两种基本的记载,与印度之说没有关系。第一种是体现苯教观点的记载,即在碑文中所记载的那样,吐蕃第一代赞普聂赤赞普是天神下凡为人主的,即吐蕃赞普是天神的后裔。第二种说法是第一代赞普是出生在波沃(今波密)一带的人,后流落到雅砻一带,成为悉补野部落的首领,并成为吐蕃第一代赞普,这是很早以来民间流行的传说。

以上这两种记载源于古代西藏本土的古老传说。吐蕃赞普祖系源于古印度一说,有理由认为是产生于后弘期。当时有学者认为,古印度学者商羯罗主的《胜出生神赞》经文中记载的古印度释迦族一支后裔就是吐蕃赞普的祖源,但这个说法在很早就受到了学者们的反驳,不足以可信。有趣的是,碑文所记载的天神之说中有关第一代赞普父系为“恰”氏族的观点,在敦煌古藏文文书中也找到了相同的记载。我们知道,“恰”氏族是藏族远古历史上的显赫氏族,苯教祖师敦巴喜饶米沃齐的母亲就出身于“恰”氏族,把吐蕃赞普祖源“恰”氏族视为天神,其意义在于显示吐蕃赞普祖源的至高无上。

西饶果恰:似乎到了西藏地方分裂割据时期(后弘期),立碑刻石的现象就少了,请问是否如此?

巴采·巴桑旺堆:在西藏地方分裂割据时期并没有停止立碑刻石,但石碑的数量少了许多。目前可以见到属于分裂割据时期的石碑有3通,立碑时间是11世纪。第一通是彭波杰拉康的石碑,该寺是公元1012年由尚·那囊多吉旺久所建。这通碑文既有吐蕃时期的字形和语法特点,也有11世纪的文字特点。此外,在杰拉康还有一座非常珍贵的弥勒石雕像,石像背面刻有一段经文祈祷词,可能是后弘期稍晚时期的遗物。第二通是堆龙热擦寺石碑。我曾多次对此石碑进行了详细考察和研究,认为与此碑有关的一个问题需要说明。根据《青史》、《贤者喜宴》等多部史书记载,建造热擦寺的也是尚·那囊多吉旺久。但通过对这通石碑的考察,我认为上述



记载有误。在碑文中明确记载建造该寺的人名叫热氏沙门云丹杰。第三处是藏仲石碑,位于扎囊县藏仲村。由于先前没有人抄录碑文,后石碑又受到破坏,无法了解有关此碑的更多信息。但通过残碑可以见到大日如来佛像。因此,我个人认为此碑应属11世纪。另外,桑耶钦普有一通14世纪的石碑,是记述隆钦饶绛大师业绩的。

西饶果恰:以上所介绍的石碑,现存状况如何?

巴探·巴桑旺堆:“文化大革命”中惨遭破坏的有噶琼碑、谐拉康东碑、楚普寺碑。噶琼碑、谐拉康东

碑已经无法复原,不过楚普寺碑在1980年后已复原,损坏部分用水泥进行了修补,但部分文字受到了破坏。此外,冲钦石碑不知何时遭受破坏,现存四节残碑。其他石碑和石刻文字存在状况基本依旧,但保护前景令人担忧。

西饶果恰:非常感谢老师对西藏古代石碑和石刻文字所作出的详细介绍,今天的采访就此结束。希望老师今后能在西藏文化和历史方面给予更多的指导。

## On Ancient Tibetan Stone Tablets and Stone Inscription Culture ---An Interview of Outstanding Tibetan Scholar Bacha·Basang Wangdui

Sherab Guocha (interviewer)

Translated by Zhigong Langjie Pentso Tajie

(①Tibetan Studies Institute,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②Research Department, Tibet University Lhasa, Tibet 850000)

**Abstract:** Bacha·Basang Wangdui is a researcher of Tibet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 the vice president of Association of Chinese Minority Historians and the member of Association of Chinese Historians and Association of International Tibetan Studies, . He has been studying Tibetan religion history, funerals in Tubo Kingdom, ancient Tibetan stone tablets and inscriptions and is a quite influential expert in the field. The paper, through interviewing Mr. Basang Wangdui, introduces the related ancient Tibetan tablets and stone inscription culture.

**Key words:** ancient Tibetan stone tablets; the location; content

[责任编辑 拉巴次仁]

### 我校与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申报的 2008 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获立项

我校与西藏社会科学院联合申报的《维护西藏地区社会稳定对策研究》获200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立项资助。我校政法学院卫绒娥教授、何勤勇副教授承担了其中两项主要子课题的研究。